

上海咨询信息 (月刊)

2012 年第 11 期
(总第 304 期)

主 办：上海市咨询业行业
协会
印 刷：上海欧阳印刷厂
有限公司

目 次

- 协会工作 •
 - 上海市咨询业行业协会会长张祥率代表团出席 2012 启东
科技节 郭德利 (2)
 - 第八届上海市青年咨询论坛召开——“滨江崛起与文化发展”
..... 贺静 (3)
 - 协会 16 家会员单位参加军民两用技术促进大会暨项目
对接会 郭德利 (4)
- 专家观点 •
 - 中国经济奇迹，未来仍将“可持续” 林毅夫 (5)
 - 效益最大化与新经济模式 李桂花 (6)
 - “营改增”为何势在必行？ 朱为群 (8)
 - 谁说中国制造业毫无前景？ 叶檀 (10)
 - 关于中国经济再平衡的三个误区 凯文 (12)
 - 中国制造须从“劳动自由流动”破题 谢作诗 (13)
- 咨询专论 •
 - 中国新能源产业不能再搞“大跃进” 郎咸平 (15)
 - 美媒 中国不会超过美国的三个原因 (17)
- 行业动态 •
 - 2012 中国管理咨询机构 50 强首次发布 (18)
- 聚焦中国 •
 - 高速增长了很多年的税收，正在放缓增速 (20)
 - 我国地方非税收入暴增须警惕 (21)
 - 重庆将现物流银行 (21)
- 世界瞭望 •
 - 水处理市场 2015 年将达 137 亿 (22)
 - 日本企业投资转向蓬勃发展的东南亚 规避中国风险 (22)
 - 美国出口原油了 中国怎么办 (24)
- 封二 • 上海市水利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 协会工作 •

上海市咨询业行业协会会长张祥率代表团 出席 2012 启东科技节



2012 中国·启东科技节暨沿海开发经贸洽谈会于 10 月 23-24 日在启东举行。应启东市委市政府邀请，上海市咨询业行业协会会长张祥率协会代表团一行十八人出席 2012 启东科技节。

23 日下午，张祥会长在启东宾馆作《全球视野下的我国服务经济的发展》专题报告。会议以后，启东市委市政府领导拜会了张祥会长，与协会陈积芳、印保兴和李小钢等三位副会长进行了热情洋溢的交流，并就启东地区服务经济发展与上海咨询业行业协会的工作对接进行了初步探讨。张祥会长向南通市副市长黄爱军、启东市委书记费高云、市长徐峰、副市长张建新、张卫生、叶辉等十二位党政领导和启东科协领导赠送了《转型与发展——全球视野下的中国服务经济》一书。

24 日，启东科技节开幕式上，张祥会长作了祝贺词。国家科技部和中国科协的领导也应邀出席了开幕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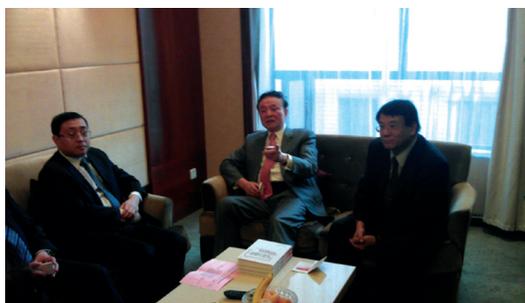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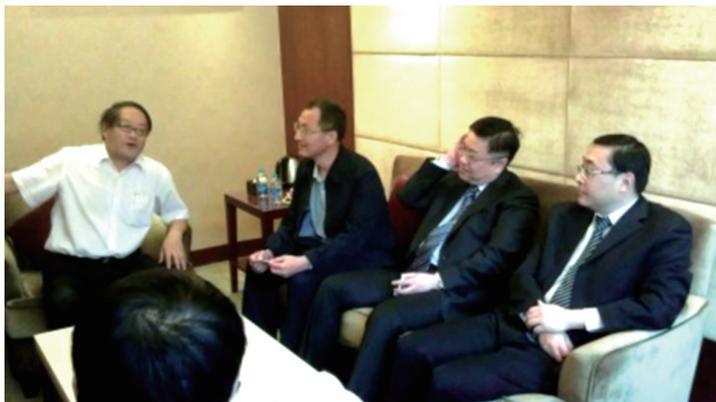
本届科技节的主题是“科技促进发展，人才引领未来”。200 多名中外客商和国内著名院所的 150 多位专家教授聚集启东，当天共签约产学研重大项目 158 个，总投资 72.67 亿元，其中 7 成以上是新材料、新能源、节能环保、现代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

科技节期间，有关部门为启东市的“国家火炬计划节能环保装备及基础件产业基地”、“省节能环保装备及基础件产业园区”授牌；举行了重大项目开工奠基仪式、启东高新技术风险投资

有限公司揭牌仪式、启东市农村科技服务超市启动仪式、产学研合作洽谈会、启东市“创新创业”英才代表座谈会以及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等活动。

启动科技节从 2003 年至今已连办 10 届，累计签约产学研合作项目近 800 项，引进高新项目近千个，总投资 900 多亿元。

(郭德利)



第八届上海市青年咨询论坛召开——“滨江崛起与文化发展”



2012年10月12日下午，秋高气爽、秋风宜人，上海市咨询业行业协会与徐汇区青年联合会共同主办的第八届上海市青年咨询论坛——“滨江崛起与文化发展”在音乐文化的圣殿上海音乐学院隆重举行。来自上海市咨询业行业协会青年会员、市民建会员、市共青团、区青联委员、青年知识分子、企业家、青年代表等100余人参与。

上海市咨询业行业协会副会长陈积芳、徐汇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吕晓慧出席本次论坛并分别致辞，陈积芳副会长在发言中凭借多年咨询行业经验，对徐汇滨江现阶段的打造及未来的发展给予很大的期望，而吕晓慧部长作为徐汇滨江的主人，则从徐汇滨江优越的地理位置、优厚的本土资源以及在徐汇区乃至整个上海未来的发展中担当的重要角色给予了最全面的诠释。

随后，与会来宾观看了精美的徐汇滨江宣传片视频。来宾们犹如如身临其境般观看了徐汇滨江的胜景，波光粼粼的江面、修剪整齐的草坪、极具文化特色的建筑群，都在向大家陈述一个事实，徐汇滨江不仅将为徐汇地区的经济发展带来强大的推动力，而且将给上海未来的文化发展带来新的契机，更重要她将为上海人民提供一个休闲、娱乐、度假的好去处，真正为人民造福。

会议特邀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咨询部主任、民建上海市委专职副主委张兆安先生作了“关于文化与经济如何融合发展”

的精彩演讲。他的演讲把本次论坛推上了又一次高峰，张兆安先生通过自己多年来对经济的理论研究及实践经验，提出了一个非常新颖的观点，即：文化必须有两个重要内容“主题”与“载体”，针对这个观点，张兆安老师进行了深刻的剖析与讲解。他提出，任何没有“主题”与“载体”的文化都是有问题的，都是片面的、不容易被接受的，别人不接受这种文化，不是别人没文化，而是你的问题，是你不能给别人接受这种文化的主题，不能提供别人接受这种文化的载体。张兆安先生还将这个观点落地到徐汇滨江的崛起与文化发展上，他说徐汇滨江的优势是非常明显的，现阶段发展的方向也是非常不错的，但是光有“主题”还不够，不够鲜明、不够立体，应该更清晰些，更有徐汇滨江的特色，更能为徐汇滨江的未来发展准确的定位。滨江，浦东有世博沿岸、黄浦有外滩、咱们徐汇的滨江一定要有徐汇滨江的独特之处，独一无二、独领风骚……

张兆安先生演讲的过程中，台下一一次又一次传来参会者阵阵雷鸣般的掌声，现场气氛非常热烈，而每次掌声过后，大家又会不自觉的立即安静下来，继续听张兆安先生的演讲，生怕把哪里漏掉了。

中共徐汇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彭秋萍女士在会上对徐汇最新的人才政策向来宾进行了解读：徐汇的人才政策不仅仅是针对个人的，更重要是能够给人才提供家庭需求的保障，教育、医疗、住房这些生活所需，将由徐汇区一并解决，可以完全解除来徐汇就业人才的后顾之忧。

最能引起现场互动的“头脑风暴”开始了，参与本次“头脑风暴”的嘉宾有来自君合律师事务所顾问黄荣楠、国家文化产业基地文化市场中心主任李康化、中国移动互联网产业联盟秘书长李易、联合投资副总经理孙曦东，以及ICS频道主持人曾在多部热



门剧集如《蜗居》中饰演角色的史蒂文·韦德斯。主持人刚刚宣布“头脑风暴”开始，舞台右侧的新浪微博滚动大屏幕上，来自场内场外的互动已经层出不穷了。

针对来宾的各种提问、几位嘉宾从各自从事的不同行业、不同工作内容，阐释了他们对于文化的不同看法，对于滨江未来的发展，提出将要给予最大的支持与配合。针对即将在徐汇滨江起航的大型动漫综合体梦工场，孙曦东总经理给予了更多的信息，梦工场在徐汇滨江的筹建与发展，目的是要打造徐汇滨江的特色，为在上海乃至全国打开动漫产业文化提供一个重要的窗口，在这

个问题上，吕晓慧部长也进行了说明，她说动漫产业的引入无疑是对中国动漫产业未来的发展开个好头，我们也将拥有中国人自己的星光大道，超过好莱坞。

几个小时精彩的论坛在不知不觉中进入尾声，通过本次第八届上海市青年咨询论坛—滨江崛起与文化发展的圆满举行，徐汇滨江文化发展的未来更加清晰，让我们携手用上海的底蕴，世界的眼光，发展滨江文化上下游产业链，使上海不仅是中国文化的码头，更成为中国乃至世界文化的源头！

(贺 静)

协会 16 家会员单位参加军民两用技术促进大会暨项目对接会

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和上海市国防动员委员会主办的 2012 上海第二届军民两用技术促进大会暨项目对接会于 11 月 1-2 日在上海科技馆举办。本次大会将以“军民融合，创新发展”为主题，从深度和广度上不断实践军地两大板块对接，探索军民融合，寓军于民的科技创新机制，实现“大手牵小手”，帮助企业进入多次配套，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科技部副部长陈小娅、解放军总装备部副部长刘国治出席开幕式，上海市副市长沈晓明、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彭水根分别做主题报告。

大会上，总装国防知识产权局、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等中央和部队有关部门，分别与上海市知识产权局、上海张江高新区管委会等地方单位签署了四项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上海电气核电设备有限公司等 13 家单位，在会上签订了 7 项军民合作项目协议，项目总金额超过 35 亿元。

上海市咨询业行业协会推荐的 16 家会员单位的企业资料被编入《2012 上海军民两用技术项目汇编 创新

能力建设篇》。2012 年 6 月协会了解到 11 月将在上海召开军民两用技术促进大会暨项目对接会。根据协会会员单位的业务范围，可以为部队军事工程及军工企业提供大量的咨询服务的特点，协会工作人员主动走访上海军民两用技术协会与上海市科技交流中心的领导，提出要将我协会部分会员单位的介绍纳入促进会的工作内容中。经过协会发放调研表，电话介绍，首次成功组织上海勘测设计研究院、上海隧道工程轨道交通设计研究院、中国轻工业上海工程咨询有限公司、上海城市建设设计研究总院、上海邮电设计咨询研究院有限公司、上海东方投资监理有限公司、上海上投国际咨询有限公司、上海立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上海大华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上海国际港口工程咨询有限公司、上海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集团）有限公司、上海正弘建设工程顾问有限公司、上海上梓建设造价咨询有限公司和水到渠成建设规划设计（上海）有限公司等 16 家单位参加该项活动。

(郭德利)



中国经济奇迹，未来仍将“可持续”

前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北京大学教授林毅夫

导读：近日前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北京大学教授林毅夫来到南京农业大学。自始至终保持温文尔雅微笑的他，为大学生们把脉“中国经济”。他视野里的世界奇迹的未来，与这些词密切相关：“潜力、改革、分配、调控、后发优势、放缓、回升。”总的基调是：乐观、坚定而理性。

中国经济已经持续增长了32年，成为世界的奇迹，其在过去就是可持续的，未来也是如此。尽管面对欧元区危机和世界需求萎缩的逆风，中国依然能够继续其强有力的增长。中国未来20年，具有能持续年均8%增长的潜力。届时，中国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收入将达到美国的一半，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的经济总产值将达到美国的2倍。

中国大陆目前的经济发展状况相当于1951年的日本、1977年的韩国和1975年的中国台湾。在随后20年中，这三个经济体分别保持了9.2%、7.6%和8.3%的增速，在同样的水平上，这些地方利用后发优势可以维持20年8%-9%的增长，为什么中国会不具备8%的增长潜力？

从新结构经济学角度看，经济增长是技术创新、产业不断升级、资源从附加值较低的领域重新配置到附加值较高的领域。发展中国家的创新、产业升级，可以模仿，成本低于发达国家。从经验来讲，工业革命以来，发达国家经济平均年增长率为2%；发展中国家由于有成功和失败的双重实例，增长率分歧越来越大。但从二战后，平均来看，发展中国家增长率比发达国家高一倍以上。

之所以要强调这个判断，还有另一个原因。改革当前问题的时候，要给未来继续增长创造条件。如果停下经济发展来进行改革是不会成功的。

我们必须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去解决一个发展中国家和转型中国家体制、机制存在的问题。

我提出的‘中国还有20年可年均增长8%’的判断，是指有如此的增长潜力，而不是意味着一定将有这样的客观事实。而增速潜力被发挥出来，要满足诸如收入分配、金融结构、政治腐败等多个问题被解决的前提条件。

要能够真正发挥8%的经济增长，就要解决收入分配，这个当前中国最大的问题。各种经济怪圈的始作俑者，正是收入分配不均。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储蓄的比重越来越高，消费的比例越来越低。而收入分配不均必然产生的结果是消费抑制。低收入者消费倾向高，但能支持消费的资金有限；而高收入者消费倾向低，投资意向高。这样的结果是，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失调。如果不断地将穷人的财富向富人的手里转移，消费比重只能不断降低。如果将这些财富向大企业集中的话，那么消费比重将会更加低。

收入分配不均，导致投资过快，产业出现产能过剩，必然就要出口到国外去；出口过多、贸易顺差过大，又导致外汇积累过多；外汇一多，又需要增发货币来购买外汇，这样一来，银行口袋的资金就增加了，又导致货币信贷投放过大，从而导致投资的资金过多。

面对这种怪圈，中国应该怎么办？可用中国的成语，一个是扬汤止沸，一个是釜底抽薪。

先说小药方，扬汤止沸指的是宏观调控，比如增加富人税收，减少穷人税收，但需扬汤止沸、适可而止，不能烧得太厉害导致爆炸。

深化市场体制改革才是釜底抽薪的大药方。

现在已到了必须抛弃双轨制的时候了。即使没有低税收、高补贴的特殊优惠，许多大型垄断企业也已经完全可以参加国际竞争了。在自由的市场体制下，比较优势产业就能得到更多的发展，就业机会会相应增多，劳动者拥有的比较优势资源的价格会不断上升，而资本回报则会相对下降，经济就可以发展得又快又好。

有人问，“为什么统计报表上的收入增加了，但个人实际感受却没有增加呢？”其实，个人感觉是和隔壁人的比较，而不是和自己的比较，这是一种感觉上的误差。举个例子，我1987年和夫人、小孩一起从美国回来，狠狠买了八大件：电视、电冰箱、洗衣机、洗衣机，还有就是给房间装4个电风扇。林毅夫笑说，当时根本没想到，家里面会装空调，可现在几乎家家都有。当时自己还带回来一辆很小的轿车，去拿执照的时候，工作人员说，那辆小轿车是整个北京第二辆私人

拥有的小轿车，可现在呢，你去大街上看看，车水马龙，你还觉得生活没改善吗？

1998年的高速公路是4700公里，到2002年的时候已是25100公里。北京市在1998年只有一条高速公路，2008年那一轮宏观调控之后，建了6条，刚建的时候都是有路没车，现在大部分路都拥挤。

确实，当前经济在放慢。放慢的原因有以下几点，首先，中国是一个出口依赖程度很高的国家。目前美国、日本的经济还没恢复，欧洲经济在下滑，这对我国影响很大。其次，2008年的那一轮宏观调控，国家投入4万亿，到后期基础设施大部分项目要收尾乃至已经完工，市场需求下降。但是，国家已经有新一轮的积极财政政策。我相信，一万亿发下去之后，市场会回升，很可能到四季度就会回升。

（摘编自：《新华网》）

效益最大化与新经济模式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李桂花

现代企业是人类经济合作中的一个伟大创新，基于人类信用秩序的扩展，创造了丰富的物质文明，提升了信用秩序的维度。但是另一方面，现代企业所占用的大量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的社会成本并未被合理计量，例如环境污染的加剧、对子孙后代福利的透支等，都与现代企业和现代化大生产有关。我们认为，问题出在企业目标的偏离——利润最大化。

利润最大化导致企业社会成本与自身成本计算之间、社会效益与自身效益之间的不匹配。由此，工业化企业普遍没有承担应承担的实际社会成本，从而加重了社会负担和后代的负担。而现代市场经济的主观博弈模型中，作为经济理性基石的“自利最大化”逐渐被等同于私利最大化、物质利益最大化。其对社会文化的影响是：以短

期内的物质财富的获得（和捐赠）作为衡量社会地位和人生价值的标准。

修正“利润最大化”的偏差，方案是代之以“效益最大化”。

效益最大化与利润最大化的不同点在于：前者在计算成本时，将社会成本纳入企业成本的计量，将正外部效应纳入企业利益的计量，将企业规模不同所占用的社会资源纳入企业责任的计量，并通过东方智慧来重新审视利益观，为这种计量方式提供个体理性的基础。

社会成本与企业效益

新古典经济学中，企业是一个投入产出的“黑箱”。打开“黑箱”查看的关键人物是新制度经

经济学的创始人科斯。科斯分析了企业内部交易成本与市场运行成本，分析了企业规模的边界，进而提出了“社会成本”概念。

在吸收了科斯观点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企业的成本不仅应计算直接成本，还应计算企业行为给社会造成的影响；同样，效益的衡量也应该考虑外部效应。再者，企业的运作会占用社会资源，从而排他性地占有了其他人和企业的创业和发展机遇，对于社会来说存在机会成本，因此，大企业应承担更多社会责任。如果不能主动承担责任，政府则应在税收上强制再分配，占用资源越大，机会成本也就越大，税收也就应该越多。我们可以称之为“社会机会成本”。

我们还可以得出另一种企业效益的衡量方式：

企业效益 = (企业收入 + 社会效益) - (企业成本 + 社会成本) - 社会机会成本
这种将社会成本与收益纳入衡量范围的企业效益计算方法，显然与利润最大化是不一样的。

不过，这仍然是在现有新古典经济学框架下的公式，还不能脱离事后治理的模式，也就不能真正解决经济的可持续问题。要真正解决经济的可持续问题，需要借鉴东方智慧，重新衡量“利益”。

重估“自利最大化”

在不确定性条件下，每个个体判断自利最大化的程度不同，方式也不同，有些手段并未能实现其目的，或者无法在短期和长期间保持一致和均衡。这反映了理性水平的差异。我们只能假定在信息完全透明的状态下，经济人的理性水平是无差异的。否则，差异容易形成，由于遗传、教育、环境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个体的理性水平更会表现出先天的差异。

同样，对于自利最大化的组合中的偏好选取标准也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由此也引出了经济福利与非经济福利、自利与利他的矛盾。这些矛盾在完美理性下是不存在的。信息越充分，理性水平越高，这种冲突就越容易被技术性地加以解决。

在东方智慧的眼光里，人、企业、国家都是

具有相似特征的生命系统，随时通过物质、信息、能量的综合交易实现生存与成长。物质和精神利益是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否则，必然出现失调。

就成本而言，除了付出的物质成本外，还包括时间精力和精神负担交易成本。收益不仅是物质利益，还包括认知的提升和技能的提高带来的精神愉悦和对思维模式的提升，这在日后会体现出决策能力、生产能力的提升，同时是效益的提高或者成本的降低。

和谐的理性是一个人的生命健康成长的源泉。精神和物质若不能和谐，必将导致身心的失调。而精神和物质是相互作用的统一体。物质利益的获得需同时付出体力和心力（精神负担以及智力运用等），精神享受也必须以一定的物质做基础。二者割裂或失调，是系统无序的最大动因。为此，人若要持续增长，就必须协调自身的精神与物质、与人交往的物质利益与信息收益、对环境的利用与养护等等。以这种方式指导其行为的人，我们称其具有和谐理性。

以上我们分析了企业的效益绝不像利润这样简单。只衡量利润、而不衡量社会物质成本和人的交易成本，是产生环境危机以及人的幸福感下降的一个重大因素。

这个原理的实现机制先从个体（家庭内部）的关系上清晰反映出来，接着在企业的交易中和企业管理内部也开始被注意和实施（反映了经济伦理的社会化或者说经济理性的升华），然而，绝大多数国家还没形成、政府也少意识到这一点（这是宏观经济学的机械物理观及宏观经济分析分离的结果）。

新经济模式预测

从长期看，有什么样的经济理性，就有什么样的制度，也就决定了增长的模式。和谐理性的共有信念使信用得以保证和延伸，保证了社会稳定、有序和开放，从而促进了社会成员之间的交流竞争和合作。分工合作使个体间的交易维度大大提升，获得了高于个体成果简单相加的超额的物质和精神的生长。这种生长的成果积累到一定程度，便可以发生突变，打破原有的均衡而整体

提升,系统变得更有秩序、更开放、更和谐。这就是和谐理性指导下的循环累积的可持续性增长过程。它与资本主义的繁荣—危机—复苏的封闭式的重复循环不同,而是向高层次突破中的自我扬弃。

在新的经济模式下,不再有物质和精神的分离,工作成为愉快生活和生命成长的一部分,老板和员工之间、人与自然之间不再是对立和争夺的关系。社会地位不以财富的积累来衡量,而是以生命综合利益来衡量,以个体自身的提升和努力来衡量。

由此,人们自觉地不做那些破坏环境以扩大

物质欲望的生产行为,不以恶性竞争和欺压的方式获得短期物质利益,而是在感恩、守信用的自律约束下,达到人与人、人类与其他生态之间的平等、和谐、共融,从而享受心灵的安宁和可持续发展的乐趣。

由此,自然大大降低了交易成本,不管是人自身的、人与人之间的交易成本,还是社会管理方面的成本;人们的精力从而集中在有利于整体的创新和对生命的探索上,而不是单一为生存和竞争而拼搏。由此,人类精神文明必然有新的飞跃。

(来源:《社会科学报》)

“营改增”为何势在必行?

上海财经大学研究生部副主任 朱为群

10月18日,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扩大营改增试点工作座谈会,并在会上提出,推进营改增是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重头戏”,是以结构性减税促进稳增长、调结构的“关键点”,要根据国家和地方财力能力,逐步将营改增扩大到全国。这是中央高层对营改增试点的又一次表态。可以说,营改增的基本方向已经确定,未来我们要做的是尽快把此项改革推向全国全行业,实现真正统一的增值税制度。之所以改革如此紧迫,是因为目前局部地区、局部行业的改革,虽然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也造成了税制的复杂化,出现了许多不公平现象,只有通过全方位推进改革,才能消除这些问题。

在我国,增值税是最大的税种。从理论上讲,征收增值税最大的好处,是在为政府取得足够的财政收入的同时,让税收对经济发展产生的扭曲作用最小化,让税收回归其中性功能。税收的本质是为政府的公共产品和服务提供资金,但是我们过去数十年的计划经济体制已经把税收异化为调节市场的工具,通过税收的提高或降低,来抑

制或促进某一个产业、企业的发展。

计划经济的典型特征之一,就是不同行业之间的税收差别很大,政府希望运用税收来调节企业的行为,而非让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作用,这种理念是不正确的。税收的主要功能应该是满足财政收入的需要,而不是调节经济,税收的调节作用应该受到约束,我们不能把税收功能的定位搞错了。而增值税最大的长处就是它能够在取得相当收入的同时,又能保持不干扰经济,所以它受到了全世界的追捧。

在过去短短几十年时间,已经有148个国家纷纷采用了增值税制,从实施情况来看,确实是朝着回归税收本来功能的方向发展,不是去调控经济,而是尽量减少对经济的干扰和扭曲。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我们还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国家,尤其是最近一段时间,强调行政控制、调节的倾向越来越严重。营改增的方向是让增值税在更大范围发挥它的中性作用,而不是调控作用,所以这是一项让政府之手退出的市场化改革。

改革最后会进行到何种程度还难以预料，因为现在还没有出台明确的时间表，扩围的步骤也并不十分清晰。但中央政府已经认识到，增值税和营业税并列的局面是不可取的一同是做生意，不同的行业缴的税不一样，有的缴增值税，有的缴营业税，这种税制会对交易行为产生差异性引导。从理论上讲，不管什么交易，都应该缴同样的税，这才不会对经济没有干扰。税收的目的只是为了取得财政收入，营改增的方向正是如此，打破营业税和增值税并存的格局，取消营业税，实施统一的增值税。

理想化的增值税制是覆盖所有的行业，按照单一的（而非多档）税率征收，像加拿大、新加坡、日本等许多国家都是这样做的，它们为了体现税收不干扰经济的中性作用，在税率上是单一的。只有实行单一税率，才能对所有行业保持一致，让市场说了算。

其实，营改增是历史遗留问题。我们在1994年税制改革的时候，就企图全方位推行增值税，但是由于改革难度太大，最后只在部分行业完成了改革，形成了营业税与增值税并存的格局。今天的改革困难依然存在，能否改革成功关键取决于三个因素——税基、税率以及中央和地方政府的税收分配比重。

首先是税基。增值税的好处要发挥出来，必须要实现税基全方位覆盖，所有行业都实行增值税，这样才能环环相互抵扣，不会出现断层；其次是税率，目前试点地区的税率有四档，在过渡时期实行多档税率并无不可，但将来应该尽可能地减少档次。最理想状态是实行统一的税率。

关于央地税收比重，在试点阶段，营改增的全部收入都归地方，但未来肯定要重新划分。营业税是地方税，而且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较高；增值税是共享税，中央占75%，地方占25%。营业税改增值税之后，未来税收的归属问题现在还不明朗，全部归地方只是暂时之举，不可能一直如此，这也是营改增的一个重要不确定因素。到目前为止，央地的分享比重问题，似乎尚未被纳入讨论议程，但这个问题是绕不过的，迟早会出来。

增值税应该更多地倾向于地方政府，让中央占大头是不合适的，本来央地之间的财权和事权已经严重不对等，如果维持原来的分享比例，那么对地方政府的收入就会造成很大的影响，必然加重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迫使它们去卖地或者通过其他手段来取得财政收入。所以，我们必须加大地方政府增值税的分享比重，具体的比例可以参照国外的一些做法。

在试点过程中，我们看到小部分企业的税负不降反升，引起了公众对营改增的质疑，实际上这种现象正是因为增值税尚未实现全覆盖，才在一些地方出现了断层。比较突出的是交通运输业，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

第一，交通运输业主要购进物品是车辆，而车辆的购进一般是集中性的，不会每个月都买，这样可能他们在税制改革之前，就已经完成了集中采购的任务，而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他们不再有新的购车需求。而营改增规定，税改之前购入的固定资产进项税是不能抵扣的，这实际上就是存量资产的问题。按道理讲，在税制改革的过渡阶段，应该可以考虑这样一个合理因素，允许在一定时期内，给予他们一定存量资产进项税的扣除，这样可以缓解他们在改革时期税负过高的问题。

第二，虽然有进项税，但是无法抵扣，因为这些行业没有实施增值税，比如卡车司机除了买车以外，最大的进项就是燃油和路桥费。司机在全国各地跑，加油站的发票要符合规格才能抵扣，有的地方甚至根本就没有发票，而高速公路收费也不在增值税范围里面，这些成本都不能抵税。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把高速公路收费纳入增值税系统，才可以互相抵扣。

第三，是税率倒挂的问题，即进项税率高，销项税率低，税率不统一。由此可见，如果实行全国统一的税基和税率，这些问题就能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但现在上层似乎还没有很好的思考，只是走一步看一步。

政府还是延续了过去靠税收调节经济的思维，即使在提出营改增的目标时，也还是把“引导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作为目标之一。原有的营

业税的确对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不利，因为存在重复征税，增值税对这个问题有很好的解决，所以肯定是有利于它的发展。但是从未来改革的大目标来看，增值税的改革不是为了促进某一个行业的发展，因为在促进某一个行业发展的同时，就意味着限制或者歧视了其他行业。

营改增的目标应该是建立一套对所有行业、所有交易行为不偏不倚的税制，这才是公平的制度。靠税收来支持某个行业的发展，这还是计划经济的思维。今天要发展现代服务业，明天要发展航空业，后天要发展光伏业，把税收变成一种纯粹的调控工具，整个的制度目标就会一直发生变化，这是税收思想存在的巨大误区。

市场经济国家在讨论税收政策的时候，不是强调调控的问题，它们关注的只是税收够不够，能否满足支出的需要，以及支出是否合理。政府要扶持一个行业，用税收优惠政策来扶持，这种定位是错的。一个行业要发展，对政府来讲，最

需要做的不是去搞优惠政策，而是要放松对企业的过度管制，营造一个宽松、公正、透明的市场环境，不与民争利，让大家可以去参与，鼓励民营企业去做，让市场发挥作用，这是符合市场经济逻辑的整个国家治国理财应该秉持的基本信念。

营改增到目前已经取得了一定效果，重复征税的问题得到了较好的缓解，但是步子还可以迈得更大一些。现在很多同样的交易，在不同的地区执行标准不一样，同样的企业在不同地区面临的税制也不一样，这是很麻烦的。现在营改增还缺少顶层设计，高层应该更加明确，要在多少年内必须统一起来，不能走到哪算哪。如果营改增不扩围，问题就会越来越多，造成税种的复杂化，引发不公平，而越快统一，公平性就会越高，征税工作也会越简单透明。

（来源：《时代周刊》）

谁说中国制造业毫无前景？

央视财经频道特约评论员 叶檀

中国制造业陷入低谷，似乎已成夕阳产业，这种认识非常可笑。事实上，制造业需要的是升级，而非毁灭。抛弃竞次规则下的盘剥与投机，制造业才能浴火重生。

吴敬琏先生一再引用里根总统时期的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波什教授的一句话——“不管是硅芯片还是土豆片，只要能赚钱就是好片”。好企业与坏企业不是以生产什么来划分的，而是以赢利能力、管理能力以及责任心来划分的。符合世界发展趋势的制造业，仍然大有可为。

全球制造业新趋势，欧美再工业化，中国机械化以提高效率降低劳动力成本上升的负面影响，而代工企业向东南亚、南亚等地转移。

代工企业洗牌，在内外逼迫下，通过轻资产

战略突袭内地小城镇，其组织结构、管理方式等正在经历深刻变革。笔者参观的东莞搜于特公司，把传统服装企业的重资产变成轻资产，组织当地穷途末路的生产商为自己品牌代工，本公司主打设计、品牌与管理，以3个月为周期产品从设计到上柜、一天推出几十种新款产品，同时公司还有类金融企业性质，品牌加盟店的费用获取现金支持、为代工企业担保贷款解决下游生产企业的融资难题。企业整合上下游产业链资源，以高速运转的低价时髦产品致胜，走农村、小镇包围城市之路。

整合型制造企业转型有两大特点，一是快，二是轻，做不到这两点，马上会被市场淘汰。快时尚品牌核心是服装快消品的概念，ZARA、

H&M、优衣库等无不走这条路线。今秋时尚快消品价格战开打，与电商一样，企业进入速度、管理、资金极限战，从产品设计到推到门店，最快的只要一个星期左右。

在机械制造领域，则是另一场升级大战。机械制造企业位于产业链中游，是出口、制造的敏感指标，中国企业有望寄德、日等国之后，争夺中端机械制造业份额。中高端制造业，仍是中国未来的发展趋势。

全球制造业不景气在机械工程行业数据一览无余。作为传统机械工程制造大国，10月11日，日本政府内务省公布8月份核心机械订单环比下降3.3%，跌幅超过接受路透社调查分析师预期的中位值（跌2.5%），7月跌幅为4.6%。同比下跌6.1%。此订单数据是体现未来六至九个月资本投资的超前指标。另据日本机床设备工业会10日发表的统计数据表明，9月份机床设备订单总额为1072.04亿日元、同比下降3%，连续5个月同比下降。日本国内机床设备订单同比下降13.2%，连续4个月同比下降。

让我们为日本机械制造业默哀，然后将视线投向另一传统的机械出口大国德国。

德国机械出口额占世界机械总出口额的20%左右，在机械设备业的31个产品领域中德国产品在21个领域是世界出口第一，在其余领域内几乎全部位列世界三甲。机械设备制造业一直以来是德国就业人数最多的行业。根据德国机械设备制造协会的数据，2010年有90.8万人在该行业超过6000家企业从业。根据德国机械设备制造业协会数据，2011年上半年该行业收获营业额940亿欧元，同比增长18.5%；出口总额689亿欧元，同比增长18.2%，其中出口到中国93.25亿欧元，占总额的占41.5%，中国成为德国机械设备出口最大市场，所占市场份额为13.5%；就业人数为92.3万；设备开工率升至89.9%。

工业机器人的增长是一大亮点，由于人力成本上升，机器人取代人力，目前中国国内市场上有5万台左右工业机器人在服役，占全球总量的4.5%，保有量位居日、韩之后排亚洲第三，市场需求增速位列全球第一。有统计显示，2004年以

来，国内机器人市场年平均增长率达到40%以上；2011年增长率达到51%，机器人新安装量达到23000台。国际机器人联合会预测，到2014年中国将成为全球最大的机器人市场。这是具大的市场份额。

在中端机械制造领域，中国逐渐赶上，中国机械产品比德国便宜20%以上，传统的代工企业转移到东南亚之后，所需的中低端机械设备中国具有极大的优势。以印度为例，据美国加德纳出版公司统计，2011年印度是世界第7大机床消费国，其机床产业在全球排名第16位，对进口机床的依赖度达77%。据印度汽车零部件公会预计，至2018年，印度汽车、摩托车及其零部件产业每年将至少需要15亿美元购置生产设备。由于缺乏完整的配套产业链，以及精密组件，印度还将大量进口机械，以应对机械、制造企业的需求，这是中国机械设备行业的机会。

在机械制造如切削、在机器人高性能交流伺服电机和精密减速器有所突破的企业，将成为未来的赢家。挤身苹果产业链的8家A股上市公司大涨特涨，那么，真正掌握核心技术的公司，未来的前景又将如何呢？

两军交战，看准方向、占据至高点者胜。

（来源：《解放日报》）

勘 误

尊敬的会员单位及读者：

第10期《上海咨询信息》的“上海工程咨询行业的现状和未来”的文章撰稿人名字“汪天强”打印有误，正确的写法应该是“汪天翔”。特此更正。

本刊为给各位读者带来的不便特表歉意。

《上海咨询信息》编辑部

关于中国经济再平衡的三个误区

世界银行集团多边投资担保机构 (MIGA) 亚太局局长 凯闻

在上月的 APEC 峰会上, 胡锦涛主席指出, 中国经济缺乏“平衡、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这和温家宝总理五年前“中国经济存在着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结构性问题”的表述如出一辙。西方经济学家对这些表述的共识是: 中国经济增长迫切需要从投资和出口驱动调整为居民消费驱动。这种说法没有抓住要领。其实, 对中国已经或即将开始的经济再平衡的认识有三个误区。

第一个误区是, 鉴于中国经济过去 30 年投资占 GDP 的比重从 30% 增长到了 45%, 造成了经济不均衡, 所以中国迫切需要减少投资, 因为继续投资产生的回报率较低。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卡内基基金会高级研究员、世界银行前中国局局长黄育川曾指出, 中国的高投资率是建立在非常低的初始资本存量基础上的, 起点很低。中国在过去 30 年让消费增长慢于 GDP, 从而降低了消费在经济中的比重, 同时中国人更多地储蓄和投资以补充其枯竭的资本存量。即使今天, 中国的资本存量和发达国家相比仍然较低。例如, 和其他中等收入的东亚国家相比, 中国工人的人均资本不超过其 40%, 更仅仅是美国水平的 10%。

从中国经济的基本面上看, 有选择地继续投资仍然可以产生可观的回报。到中国的旅行者通常会被北京和上海这样大城市的光鲜所蒙蔽, 而不了解大部分中国二线和小城市居民仍然低下的生活条件, 更不要说缺乏大量基础设施的农村地区。中国一半的人口仍然生活在农村, 城市化进程还有一个很长的路要走。在未来 20 年内, 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会将 5 亿人从农村搬到城市, 道路、能源、水、住房以及经济里几乎所有其他方面都还会有大量的需求, 这只能通过大量和持续的投资来实现。当然, 中国的决策者们也意识到,

他们不应该复制 2008-2009 年那种自上而下的“4 万亿风格”的一窝风投资。下一轮的投资计划有可能更分阶段进行, 也可能会更多的由地方政府来驱动, 因为地方政府对需求有更具体的了解。

第二个误区是中国将通过以消费为主导的增长, 很快实现以消费为基础的国民经济; 中国经济将很快象美国和其他许多发达国家一样, 会以家庭消费为主。

在 10 月 18 日的新闻发布会上, 国家统计局表示, 今年前三季度消费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了 55%, 超过投资的贡献。然而, 这只是说明中国 GDP 的增长刚刚开始由消费主导, 并不说明 GDP 本身已由消费主导。居民消费在中国 GDP 中的份额已经从 1983 年的 55% 下降到现在的 30% 多一点。虽然现在情况开始好转, 但中国经济仍将需要很长的时间才会变为居民消费主导。目前中国 GDP 中居民消费比例较低有独特的经济背景。中国的居民消费在过去 10 年中每年以 8% 的速度不断增长, 众所周知, 中国的 GDP 增长得更快, 年均达到 10%, 所以消费占 GDP 的比重一直在下降。但消费每年 8% 的增速其实是史无前例的, 随着中国试图把 GDP 增长引导到 7.5-8% 的区间, 消费占比较低的趋势已经很自然地开始扭转。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前三季度数据也印证了这一点。

中国消费者不愿过度消费是基于很多现实和习惯。比如,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储蓄是一种美德, 不到万不得已不愿借贷, 当前社会福利体系尚不完善等等。随着政府大力刺激内需, 我们可能会看到消费增速比过去的 8% 还要多 1-2 个百分点。即使我们假设消费以每年 10% 的超高速增长, 中国也要花 20 年才会达到韩国当前消费占 GDP 的比重水平, 35 年才会达到美国的水平。因此,

希望居民消费在短期内取代投资和出口成为驱动经济的主力是不现实的。

对中国经济再平衡的第三个误区是认为中国政府将主要依赖于传统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来实现再平衡的目标。迈克尔·佩蒂斯在《华尔街日报》的一篇文章中提到：人民币升值、提高工资和提高利率是“中国经济再平衡的三条路径”。虽然我相信决策者会考虑这些政策，但中国独特的政治经济模式给政策制定者提供了一个更广泛的工具箱，使他们能够运用行政和其他政策手段对经济实现更具体的微调。

在中国，关于经济再平衡的讨论通常是基于在出口、投资和消费之间的选择，或者更广泛的

是关于国富民穷的讨论。最新的“中国统计年鉴”显示，以消费为主导的经济增长已经从2011年开始，当年消费对增长的贡献达到了55.5%。这是一个良好的势头。然而，要真正让消费驱动中国整体经济将需要很长的时间。因此，最可行的政策不是放弃投资依赖消费，而是在投资与消费、国富与民富之间维持动态的平衡，更加关注民生。更明确地说，我们可以通过走一条投资和消费之外的“第三条道路”——动用公共政策和公共资金以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以国家资源来促进集体消费（collective consumption），投资在短期和中期改善生活质量的领域。

（来源：《华尔街日报》）

中国制造须从“劳动自由流动”破题

浙江财经学院经济与国际贸易学院院长 谢作诗

有不少人，说什么中国制造是低劳动成本的成功，劳动成本上升是当前企业经营困难的重要原因。但这不准确，容易误导人。若说中国制造的成功主要是因为低劳动成本，那印度年轻的廉价劳动力比中国丰富，为何只有中国制造而没有印度制造？非洲的廉价劳动力也不少，为何同样没有非洲制造？

的确，中国制造以低成本取胜，但是中国制造的成功却主要不是因为低劳动成本，而是因为先进的生产方式。中国拥有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比拟的庞大的产业集群和细致专业的分工网络。这就是中国先进的生产方式。在零配件生产和产品组装方面，无人能敌中国。

紧接而来的问题是：为什么中国拥有庞大的产业集群和细致专业的分工网络，而他国却没有这样的规模？这得益于土地国有和政府对于经济的强大干预能力。中国大地上可以很容易地建立起庞大的工业园区，在这些园区里，工厂错落有

致，相互补充、相互支持。我曾参观过朋友的一个工厂，生产流体控制设备的，坐落在成都双流空港工业园区。他的产品几乎占领了整个亚洲市场。他的厂只生产三个部件，同时负责组装，而方圆几公里以内的厂家提供他全部的零部件。想想看，这样的生产方式，怎么可能不是世界上最低成本的生产方式？

中国创造了世界上无与伦比的生产能力，这需要强大的国内消费来吸收，同时也需要强大的国外需求来吸收。但现在由于华尔街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外需增长受到制约，并且不可能短时间得到恢复。中国于是迫切需要从依靠出口和投资拉动经济增长转向依靠消费、出口、投资共同拉动经济增长，特别是依靠国内消费来拉动经济增长。但是消费的背后是收入。没有收入叫人消费是笑话，有了收入不让人消费也不可能。收入有两个来源，一个是劳动收入，一个是资产收入。劳动收入有极限，每天最多工作24小时，不能

再多 1 分钟。因此增加收入主要得依靠增加资产收入。土地国有,这就剥夺了老百姓的资产收入,必然压抑消费,而且政府介入具体经济活动也会形成投资冲动和消费压抑。所以,过去土地国有、政府介入具体经济活动不是坏事(其实是好事),但在今天肯定不是好事。过去成功的模式未必也是今天成功的模式。今天中国经济面临结构调整的重大课题。这是后话,不在这里展开来说了。

既然中国制造的成功主要不是低劳动成本的成功,而是先进生产方式的成功,那么反过来说,当前中国制造的困难也就主要不是劳动成本上升之过。中国没有人人为的高工资、高福利,劳动成本上升不过是劳动生产率上升的结果,又怎么可能对产业经营造成困难呢?如果不是一些因素限制了劳动的自由流动,劳动成本上升,这个企业做不下去了,那一定是劳动在另一个企业里创造了更大的价值。逻辑上,在一个没有人为制造的高工资、高福利,劳动可以自由流动的国家,劳动成本愈高,经济增长也应愈快才对,因为劳动生产率也提高了。

我们知道,劳动从农业部门流向工业部门会促进经济增长。因为劳动从农业部门流向工业部门,劳动生产率提高了。我们看到劳动生产率提高经济就高增长,我们忽略了劳动生产率提高和劳动成本上升是一回事。工资报酬等于劳动的边际生产率,这难道不是经济学入门课程的 ABC 吗?如果边际这个概念你不熟悉,那你就把它直接看做劳动生产率好了。

要思考的是到底什么制约了劳动的自由流动。不是劳动成本上升本身造成了中国制造的困难,而是制约劳动自由流动的东西造成了中国制造的困难。我们要研究,沿海地区之劳动成本上升到底有多少是高房价推动的,到底有多少是户籍制度推动的?又到底有多少是医疗制度、教育制度等推动的?为什么中西部低成本的劳动不能流向沿海地区?如果说企业内迁到中西部能够低成本雇到工人,能够生存的话,那么沿海的劳动成本上升就与高房价、户籍制度、医疗制度、孩子上学难等问题大有关系,是它们制约着劳动从

中西部地区向沿海地区流动,减少了沿海的劳动供给,导致企业经营困难。如果我们不区分劳动成本上升的原因与性质,简单把制造业的困难归结为劳动成本上升,那么就会误判中国制造的病根与前景。

是的,与劳动生产率提高相伴随的劳动成本上升永远都是好事。若说一个国家增长的基础是低劳动成本,那岂不成了笑话。按照这个逻辑,为了经济增长,我们倒要有意地压低工资收入了?而压低了工资收入,经济就总是能高增长了?可是实践已经给了我们明确的答案:高增长不在劳动成本更低的非洲,而在劳动成本更高的中国。再说了,我们发展经济不就是要让百姓过上好日子吗?劳动成本不上升,老百姓的收入怎么提高,怎么可能过上好日子?所以,如果真是因为劳动成本上升使中国制造陷入困难,倒也是件值得高兴的事情。

但要克服和避免劳动生产率提高之外的其他因素对于劳动成本的推动。任何劳动生产率提高之外的因素导致的劳动成本上升都只会给经济带来噩梦,最终让人民不能过上好日子。

还要努力把劳动成本之外的制造成本降下来,比如减税、打破上游产品垄断高价等等。

没有错,中国的剩余劳动已经基本用完,中国靠低劳动成本参与国际竞争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但是中国的人口红利还在。大约,要到我这样的 60 后退休了,中国的人口红利才真正不在,才会真正进入老龄化社会。在西安、成都一个月挣 2000 块的大学生大有人在,即使在杭州这样的沿海发达地区,也还有一个 月挣 2000 块的大学生,劳动成本高了?不高。如果中国能够有效克服和避免劳动生产率提高之外的其他因素对于劳动成本的推动,并且能够把劳动成本之外的制造成本降下来,那么中国制造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中国制造生产的是吃穿住行用产品,满足的是人的基本需求,这产业永远是朝阳产业,而不是什么夕阳产业。

(来源:《华夏时报》)

中国新能源产业不能再搞“大跃进”

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 公司治理和金融专家 朗咸平

据媒体报道，继欧盟在10月8日公布了光伏反倾销立案的中国应诉企业名单后，美国商务部又在10月10日宣布对大多数从中国进口的太阳能产品征收30%以上的关税。这意味中国以光伏产业为代表的新能源产业遭到欧美以反倾销为名的全力阻击。中国新能源产业为何难逃欧美反倾销诉讼？中国式的产业升级就是“大跃进”，产业振兴就是“放卫星”，对外受歧视，对内造成巨大的浪费。对此，我在《中国经济到了最危险的边缘》一书中有详细论述。

2010年7月19日，我在电视节目里发出预警，警告大家经济会出现二次探底。可是根本没人听我的，事实已经证明2009年的4万亿和十大产业振兴根本没什么用，可是我们竟然在2010年继续搞能源5万亿。国家能源局编制了新兴能源产业发展规划，规划期为2011—2020年。该规划将累计直接增加投资5万亿元人民币。我们再仔细看看都有什么：核能、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地热能、非常规天然气等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洁净煤、智能电网、分布式能源、车用新能源等能源新技术的产业化应用。

表面上看都是新能源，实际上呢，比如说风能，各位看看那个风车其实就明白了，消耗的都是钢铁。我估计这也是因为我们迫不得已的，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钢铁的库存已经大到令人震惊的地步了。根据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公布的数据，2010年5月末，全国26个主要钢材市场5种钢材社会库存量合计为1578万吨，是2008年同期的5.5倍。所以，现在就清楚了，那就是2009年的天量信贷刺激的是钢铁的生产，而非消耗。但是2010年，在我们明明没有技术、没

有经验的状况下，一举安装了全世界最多的风电机组。结果呢，内蒙古的风电机在空转，无法接入电网、缓解电力紧张；甘肃的风机技术控制不达标，险些两次摧毁西北电网！

表面上是要开发新能源汽车，实际上呢？要解决的是汽车业产能过剩的问题。我们现在汽车的库存也大到了可怕的地步。还有投资电站，实际上是为了消耗水泥的产能过剩；投资光伏，是为了消耗玻璃的产能过剩。因为这些行业的产能过剩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也就是说，5万亿的投资进去之后，获益的全是产能严重过剩的传统行业。这让人特别担忧，因为我们产业政策已经被既得利益者绑架了，现在完全是在以纳税人为代价，搞技术“大跃进”和产业“放卫星”。

我还发现一个特别奇怪的现象，就是只要说是投资新兴产业，就会有那么一群人特别的兴奋，特别舍得花钱。这群人还不是我们的企业家，而是渴求政绩的地方官员。因为我们的地方官员更容易心浮气躁，更喜欢找“弯道超车”的机会。各位可以去搜索一下“弯道超车”这个口号，基本上都是各地党报上反复强调的。那我就请问这群人，你是企业家吗？你是创业家吗？你凭什么觉得就你有眼光，能看到好项目？而且这个项目恰巧不被现有的企业看好，恰巧又能日进斗金？其实我们完全可以换个角度去想，如果政府官员用财政投资项目、选择项目和管理项目是有效的，那么私有企业基本都可以关门了。

最可怕的是什么？是两种人的结合。一种是什么都不懂但手里掌握着大把财政资源的政绩导向型官员，另一种是什么职业道德都不管只想借机骗一把的企业家。当然，有的是要骗钱，比如

私企老板，有的则是要骗业绩，比如国企老板。于是就出现了旷世奇观的“大跃进”，比如说电动车产业，2009年十大产业规划中汽车产业振兴的规划是，改造现有生产能力，形成50万辆纯电动、充电式混合动力和普通型混合动力等新能源汽车产能，使新能源汽车销量占乘用车销售总量的5%左右。

我就十分好奇，电动车这东西在日本、美国都搞过，最后都发现产品的性能不稳定，而且油价一降下来，这东西就没人买了。我们为什么要花这么大精力搞这东西呢？更何况，我们现在的发电靠的是火电，这种发电方式的污染和碳排放都比汽车烧油厉害得多，所谓的低碳环保完全是胡说八道！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就有底气说要在这个领域超英赶美，要知道，从充电、蓄电到电路管理，这么多技术我们都还没有攻克，而且就算将来都被攻克了，这东西在推广过程中也还需要更大的基建投入，这就意味着不可能有广阔的国外市场。可是，为了这个“大跃进”，我们现在简直是举全国之力，中央财政明确要连续三年投入100亿元，此外还提供800亿元的技术改造贴息贷款。

结果基本是意料之中的。50万辆和5%这两个目标到现在都还没有达到。新能源汽车5%的销量占比就是70万辆，而现在每年的销售量大概只有1万辆。而且，车企新能源汽车的产能目前远达不到50万辆的规模。2010年底，共有54家汽车生产企业的190个车型列入《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示范推广应用工程推荐车型目录》，而在2010年以上车型的年产量为7181辆。

客观来讲，电车销量这么少，肯定不是我们的政策不到位，因为目前深圳、上海和北京对电动车的支持已经非常给力了：在北京和深圳购买电动车最高可获得12万元补贴；上海可以获得10万元补贴。但是电动车依然没什么吸引力。南方电网的有关人士透露，深圳已经建成的2000余个充电桩，基本都处于闲置状态。

最根本的原因是这东西真的太不靠谱了。众泰造了个纯电动汽车，杭州市政府花了不少力气推广，要求出租车带头示范，结果呢？起火了，吓得司机都不敢示范了，搞得政府非常没面子。还有，这些企业骗财政支持的时候信誓旦旦地保证纯电动车一次充电，肯定能续航160公里，结果一试只能跑100公里，也就是说活动半径只有50公里，如果跑去郊区的话基本就回不来了。

最后再说说风电。2011年2月24日，西北电网甘肃酒泉风电基地因桥西第一风电场出现故障，导致598台风电机组脱网，损失电力84万千瓦，电压的大幅度波动，甚至波及甘肃电网的电压和频率控制，威胁到整个电力系统安全。4月6日，国家电监会在北京召开事故通报会，最后总结了四大问题：设备设计本身不合格，风电场建设质量不合格，风电场接入对电网整体来说不安全，电力调度机构没有足够的管理能力管理风电场。这个事故就是中国的“福岛核危机”，福岛核危机叫停了中国的核电“大跃进”，而酒泉风电事故等于叫停了中国的风电“大跃进”。

讲到这里，我再把思路梳理一下。我们是以高铁投资为载体，拉动了十大产业中的钢铁、装备制造、有色金属、船舶和物流这五大产业。电动车带动的是汽车产业，当然了，汽车产业也顺便带动了石化、有色金属和钢铁；光伏带动的是装备制造、电子信息；风电、核电带动的是装备制造、钢铁、有色金属。十大产业中就剩一个了，就是纺织。可惜，也没能幸免，因为我们没有定价权，国际棉价大涨之后，我们纺织企业也欲哭无泪了。

这些产业给我们造成的损失已然成为事实，我也没什么好说的了，但我们最起码要吃一堑，长一智。当年的“大跃进”，我们为之付出了那么沉重的代价，为什么到今天还要继续“大跃进”呢？

（来源：《东方财富网》）

美媒：中国不会超过美国的三个原因

参考消息网日前编译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网站10月26日文章,题:中国不会超过美国的三个原因。文章如下:

当中国经济以每年9%的速度增长的时候,美国却因经济衰退和政治瘫痪而摇摇欲坠。美国的民意调查一再显示,大多数美国人认为中国是世界头号经济强国。皮尤研究中心调查显示,在22个国家中,有15个国家的大多数人都认为中国将超过美国成为全球超级大国。

是哈佛大学约翰·肯尼迪政治学院研究员迈克尔·贝克利说,这种普遍观点是错误的。这是在马马虎虎的分析和对国家实力的过时观念的基础上得出的虚幻想法。贝克利指出,认为中国将超越美国的人至少犯了以下三种错误之一。

1. 他们把增长率与增长总量弄混了。

自1991年以来,中国的人均收入每年增长约15%,军事开支每年增长10%。相反,美国的人均收入和军事开支的年增速分别为4%和2%。

但是增长速度是不可比的。中国2010年的人均收入是7500美元(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是,城镇居民2011年人均总收入23979元人民币—本网注),美国当年的人均收入是4.7万美元,7500美元的15%实际上低于4.7万美元的4%。尽管中国的增长速度更高,但中国普通公民与美国人相比,如今的收入差距比1991年拉大了1.7万美元。

2. 许多观察人士依赖有缺陷的指标衡量中国的经济实力。

例如,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中国是世界“领

先的技术型经济”,因为它出口的高技术产品多于其他任何国家。

但是中国的高技术出口产品并非完全是中国的,技术性也不是很高。90%以上的这类出口产品是外国公司生产的,包含进口部件,只是在中国组装而成。实际上,过去20年来,中国高技术公司在任何方面—研发、专利、利润—与美国公司的差距都在拉大。

3. 人们错误地把规模等同于实力。

中国将很快成为全世界规模最大的经济体,许多观察人士将这解读为美国与中国之间的实力转换。

但是规模并不等于实力。毕竟,曾在19世纪统治全球四分之一地区的英国,即便在最鼎盛的时期,也从来不是最大的经济体。实际上,当英国侵略中国和印度并迫使这两个国家屈服时,它的GDP只有中国的一半,也远远小于印度。

当然,中国的规模使得它在国际问题上成为重要的参与国,尤其是在气候变化和贸易领域。但新兴超级大国中国不是苏联,也不是像20世纪初的德国那样的强国。它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在可预见的未来也将如此。因此,美国人不应该害怕中国。但他们也不应该回避与这个日益崛起的国家争夺在亚洲的影响力。

来源:(星岛环球网)

2012 中国管理咨询机构 50 强首次发布

2012 年 10 月 26 日, 2012 中国管理咨询机构 50 大发布暨第七届中国管理咨询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会上, 中国企业联合会管理咨询委员会首次向社会发布了“中国管理咨询机构 50 大”名单。北京和君创业、中华财务、北大纵横分别以业务收入 3.45 亿元、1.87 亿元、1.7 亿元位居 2012 中国管理咨询机构 50 大前 3 名。中国国际经济咨询有限公司、上海 AMT 集团、上海万隆国际咨询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华彩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北京国富创新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天津倚天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北京华嘉企划有限公司分别列第四至第十位。

经过 30 余年的发展, 我国管理咨询机构实现了较快发展, 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业务与人员规模明显提升。2012 中国管理咨询机构 50 大共实现业务收入 290317.6 万元, 完成各类管理咨询项目 6788 个, 拥有员工 9340 人。其中, 业务收入超过 1 亿元的咨询机构达到 7 家, 业务收入在 5000-10000 万元的有 14 家。

中国企业联合会管理咨询委员会, 同时发布了《2012 中国管理咨询机构 50 大发展分析报告》, 《报告》中对 2012 中国管理咨询机构 50 大的业务收入、地域分布、从业人员等情况进行了分析, 指出了我国管理咨询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与差距。同时, 提出了促进我国管理咨询机构进一步发展的对策及建议。

《报告》中指出: 首先, 我国管理咨询业成立时间短, 发展速度快。2012 中国管理咨询机构 50 大中, 50% 以上的管理咨询机构是近 10 年成立的。其中, 成立时间在 1-5 年的有 4 家, 成立时间在 6-10 年的有 23 家, 成立 11-15 年的有 12 家, 成立时间在 16-20 年的有 8 家, 成立 26 年以上的有 3 家。最近 10 年内成立的管理咨询

机构总计有 27 家, 占全部 50 大的 54%。合计成立 10 年以上长期存续的管理咨询机构有 23 家, 占全部 50 大的 46%。

其次, 行业总体规模偏小, 相互之间差距明显。2012 中国管理咨询机构 50 大中, 最高业务收入为 3.45 亿元, 最低业务收入为 1330 万元, 最高业务收入是最低业务收入的 25.9 倍。从区间累计分布看, 2012 中国管理咨询机构 50 大的业务收入存在明显的前端集中趋势。前 10 家管理咨询机构业务总收入为 144850 万元, 占全部 50 大业务总收入的 49.9%; 后 10 家管理咨询机构业务总收入为 17863 万元, 只占全部 50 大业务总收入的 6.2%。从平均规模看, 前 10 家管理咨询机构平均业务收入为 14485 万元, 后 10 家管理咨询机构的平均业务收入为 1786.3 万元, 前 10 家是后 10 家的 8.1 倍。从人均指标看, 2012 中国管理咨询机构 50 大的人均业务收入最高为 246.5 万元, 最低为 11.4 万元, 最高值是最低值的 21.6 倍。

第三, 行业东强西弱, 区域发展不平衡。我国管理咨询机构的发展状况, 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状况和外部要素环境具有高度的相关性。入围 2012 中国管理咨询机构 50 大的管理咨询机构, 大多数来自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很少, 西部地区没有机构入围。全国共有 11 个省、直辖市的管理咨询机构进入 2012 中国管理咨询机构 50 大。其中, 北京市有 21 家机构入围, 占 50 大总数的 42%; 广东省有 11 家机构入围, 占 50 大总数的 22%; 上海市有 8 家机构入围, 占 50 大总数的 16%。北京市、上海市和广东省三个地区总计 40 家管理咨询机构入围, 占 50 大总数的 80%。

第四, 咨询项目数量多, 项目规模偏小。管理咨询机构因发展阶段不同, 存在不同的运作模

式,一些管理咨询机构依靠挖掘大客户的大项目,为客户提供综合性的管理咨询服务;一些管理咨询机构则大量接受中小企业的委托,提供细分专业范围的咨询服务。2012中国管理咨询机构50大共完成各类咨询项目6788个,总计业务收入290317.6万元。平均每个咨询项目业务收入为42.8万元。从每一家咨询项目平均业务收入看,50家之间相差很大,最高达到1143.8万元,最低仅有5.5万元。

第五,行业与国际跨国咨询公司比,差距显著。与跨国咨询公司相比,我国管理咨询机构的

业务与人员规模整体仍然偏小,差距依然明显。截至2011年8月31日埃森哲公司净收入达255亿美元,折合人民币达1647亿元。2012中国管理咨询机构50大的业务收入总额,仅相当于埃森哲咨询公司2011财政年度收入的1.8%。埃森哲全球员工达236000人,为遍布120多个国家的客户提供服务,2012中国管理咨询机构50大共有9340名从业人员,平均从业人员数量为186.8人,从业人员总数不到埃森哲公司雇员数量的4%。

附件:2012中国管理咨询机构前50强名单

序号	机构名称	2011年营业收入(万元)
1	北京和君创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34503.8
2	中华财务咨询有限公司	18737
3	北大纵横管理咨询集团	17074
4	中国国际经济咨询有限公司	13767.3
5	AMT集团	11876.5
6	万隆国际咨询集团有限公司	10484.4
7	上海华彩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10200
8	北京国富创新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9600
9	天津倚天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9458
10	北京华嘉企划有限公司	9150
11	重庆国际投资咨询集团有限公司	8939
12	北京仁达方略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8600
13	北京太和睿信企业管理顾问有限公司	8000
14	中智人力资源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7795.5
15	楼兰集团	7420.9
16	深圳市中旭企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6566.3
17	金蝶软件(中国)有限公司咨询服务部	6440
18	理实环球国际咨询(北京)有限公司	5986
19	北京捷盟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5308
20	北京市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	5147
21	用友长伴管理咨询(上海)有限公司	5000
22	深圳市采纳品牌营销顾问有限公司	4116
23	晋江市兴闽企财务咨询有限公司	3557.7
24	深圳市迪博企业风险管理技术有限公司	3509
25	北京第一会达风险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3500
26	上海视野经济研究所	3100
27	北京百森咨询有限公司	2935
28	北京朴智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2879
29	健峰管理技术研修中心(宁波)有限公司	2760

序号	机构名称	2011 年营业收入 (万元)
30	北京东方博融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2606.2
31	深圳市百思特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2598
32	北京赢思强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2522.4
33	央视市场研究股份有限公司	2488.7
34	北京理实佳讯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2407.8
35	北京九略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2405
36	新生代市场监测机构有限公司	2397
37	广东现代国际市场研究有限公司	2206
38	远讯咨询集团	2185
39	北京信永方略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2125.6
40	北京开卷图书市场研究所	2101.5
41	雅兴市场研究公司	2100.1
42	北京汉鼎世纪咨询有限公司	2026
43	北京华通人市场信息有限责任公司	2000
44	北京勺海市场研究公司	1980
45	北京中电力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1890.9
46	天津市智道管理科技咨询有限公司	1840
47	北京神州旗舰市场调查研究公司	1650
48	IDC (International Data Corporation)	1567
49	北京美兰德信息公司	1480
50	视野国际财务顾问(上海)有限公司	1330

(来源: 中国经济网)


 ·聚焦中国·

高速增长了很多年的税收，正在放缓增速

2012年10月22日，财政部发布2012年1-9月税收数据，全国税收总收入完成7.7万亿元，同比增长8.6%，但增速比2011年同期回落18.8个百分点。

增速放缓，主要是因为与生产经营相关的主体税种收入增速放缓，比如企业所得税比2011年同期回落21.1个百分点。而来自个人所得税的收入不仅没有增长，反比2011年同比下降8.4%。

此外，与房地产相关的税收收入也在下降。

各地方的财政收入状况也陆续公布。在一些地方，虽然税收收入增长放缓，但财政收入的另一个重要构成——非税收入，却异常大增。其中，天津非税收入增速高出税收收入四十多个百分点，安徽高出三十多个百分点。

(来源:《南方周末》)

我国地方非税收入暴增须警惕

财政部近日公布的8月财政收支情况显示,受宏观经济下滑影响,8月全国财政收入7863亿元,连续四个月下跌,其中,中央财政收入3765亿元,同比下降6.7%,与中央财政收入不同,地方财政收入在8月依然保持了一个良好的增长势头,出现了近几个月的小高峰,同比增长16.8%。在整个经济放缓的前提下,非税收入出现大幅度增长,各种的缘由耐人回味。

非税收入主要是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彩票公益金、国有资源有偿使用收入、国有资产有偿使用收入、国有资本经营收益、罚没收入、以政府名义接受的捐赠收入等。一般而言,税收收入占比高,意味着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增长质量较高。

地方非税收入的暴增,在一季度财政收入增速下滑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以今年一季度为例,全国非税收入4118亿元,增长53.3%。其中,地方非税收入3472亿元,增长50.1%。

8月,在中央非税收入下降的情况下,地方非税收入依然出现显著的增长,同比增长237亿元,增长31.6%。财政部对此的解释是,部分地区探矿权采矿权价款收入入库较多,以及地方加强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等征管,这部分非税收入相应增加。

专家表示,中央财政收入减少等相关数据指的是一般意义上的收入,而事实上,中央与地方非税收入或者预算外收入的增长速度非常惊人。经济已经面临下滑的前提,政府还在从本已不多的经济成果中分流资源,下一步会造成整体经济的现状更不好。

业界担心,在全国财政收入下滑的大背景下,地方为了缓解增收的压力,在非税收入上实现突破,通过种种收入,最终买单者仍然是企业和个人。

(来源:《中国商报》)

重庆将现物流银行

导读:澳大利亚嘉民集团与重庆两江新区签约,投资7500万美元的嘉民重庆两江澳洲现代物流园项目落户两江新区鱼复工业园。

据悉,嘉民重庆两江澳洲现代物流园项目占地200亩,总建筑面积约11万平方米,项目将分为两期开发。项目物流仓储设施,按照单双层仓储设施结合进行设计,容积率1.5以上,且按照现代物流仓储设施的建设标准修建。预计,明年年初即将动工。项目达产后,每年亩产将不低于300万元人民币,并提供就业岗位200个。

此次嘉民集团澳洲现代物流园入驻企业,将集成国内外电子商务企业、知名时尚网购领导品牌、500强第三方物流企业、亚洲著名商业银行,以高端电子商务、金融物流客户为主。嘉民相关

负责人说,国内的物流商更倾向于仓储、配送、电子网络,而“未来的物流企业,谁能掌握金融服务,谁就能成为最终的胜利者。”跨国物流业却瞄准供应链的另一个关键环节——资金流。在银行的合作下,嘉民也将在重庆两江开展“物流银行”。企业将存于物流企业的产品在银行质押,物流公司参与其中的质押贷款业务,工厂产品或商品由物流公司管理,物流公司根据银行方面的指令,管理产品或商品的进出仓业务,这样,银行对货物质押的风险可以大大降低。而企业也因此获取大量的流动资金,从而降低一半及以上的物流成本。

(来源:《中国投资咨询网》)

水处理市场 2015 年将达 137 亿

德勤近日在沪发布最新一期《德勤化工季刊》，其中预测，中国水处理化学品的需求未来 5 年每年增长 10%，行业前景广阔，但未来 3、5 年内将迎来整合。同时，该行业正由通用向专用化学品转型，提供定制个性化解决方案和现场服务是该行业的发展趋势。其中，一线企业的毛利率有望超过 50%。

根据报告，2010 年中国水处理化学品市场约为 85 亿人民币，到 2015 年将达 137 亿元人民币，整个行业增速迅猛，极具潜力，且需求十分

庞大。GWI（全球水资讯）统计显示，到 2016 年，中国水处理行业相关市值将达到 740 亿美元，成为继美国之后的全球第二大国。

水处理行业属于中国“十二五”规划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的节能环保产业。中国政府对该行业规划的重点是新设备的产业化、新型解决方案的研发，以及相关服务业的发展。这些规划将共同推动该行业朝着特种产品、解决方案和现场服务的方向发展。

（来源：《中国管理咨询网》）

日本企业投资转向蓬勃发展的东南亚 规避中国风险

路透金边 11 月 6 日电—Hiroshi Uematsu 在柬埔寨一经济园区中担任主管，该园区主要目标是吸引日本方面的投资，然而他的起步并不顺利。他刚到职后不久便碰上全球金融危机，导致亚洲小型经济体的出口直线下降，也使得投资意愿大减。

但到如今，他的业务看来形势大好

这个在柬埔寨首都金边市郊的经济园区占地 365 公顷（900 英亩），现有约有三分之一土地闲置，杂草丛生，骨瘦如柴的牛只漫步其中。但这些土地正被迅速地由日本知名企业所拿下，包括雅马哈发动机株式会社、食品大厂味之素以及电子公司 Minebea 等等。

在 Uematsu 办公室旁边的杂货店中，有贩卖多种品牌的清酒、“东京汉堡”以及多种日本零食，以一解这些日籍主管的乡愁。

Uematsu 命运的转变反映出日本在东南亚投资大增的整体趋势，因薪资升高及中日领土争议所引发的紧张情势使得中国投资的魅力大减。

“中国以往是世界工厂，现在不能再这么说了。”来自岐阜县、现年 45 岁的 Uematsu 表示。他说他每天接到许多对金边经济特区有兴趣的企业来电。

重新思考中国战略

在近期中日因领土争议而导致紧张情势升高之后，路透进行企业调查显示，约有四分之一的日本制造商正重新思考中国的投资计划。

去年日本遭遇地震海啸以及泰国洪灾问题，再次用力提醒企业分散营运据点的必要性，以免受到全球供应链中断之苦。

日本财务省数据显示，日本去年对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的净外商直接投资（FDI）增加

超过一倍,创下 1.55 万亿(兆)日圆的纪录新高。日本对中国的净 FDI 仍持续增加,2011 年成长了 60% 至创纪录的 1 万亿日圆。

但日本企业在强势日圆的激励下向外扩张之际,正逐渐扩大运用东南亚作为替代的生产基地,以降低其所面临的中国风险。日本政府和企业领袖亦一直是最为积极开发缅甸的潜能,对缅甸投入数以 10 亿美元计的基础建设支出,并给予债务减免及再融资。

不仅因为劳动力廉价

这不仅是因为工资水平低。随着中产阶级迅速增加,这个拥有 6 亿人口的地区也给日本汽车、电子产品和服务提供了不断增加的需求来源。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的工资高於越南和柬埔寨,但日本对这两国的兴趣也在增加。

铁路和公路基础设施投资强劲增长,东盟致力於在 2015 年底之前建立欧盟式的统一市场,届时将使跨国企业更加容易整合其跨境业务。该地区经济今年面对美国、欧洲和中国经济增长疲软,表现出很强的韧性。

财务省数据显示,1-8 月日本对东盟净投资达到 4,180 亿日圆,不过这些数据可能没有反应很多投资承诺。4-6 月当季,东盟的净外商直接投资(FDI)较上年增加 37%。

东盟国家最新的 FDI 数据亦说明,日本投资强劲的趋势没有改变。

以越南为例,政府数据显示,1-10 月日本承诺的投资增加至 49 亿美元,比上年全年总额高出一倍。

“2011 年,日本企业从两场灾难中得到教训,”日本贸易振兴会(JETRO)驻越南首席代表 Hirokazu Yamaoka 称。“今年又认识到中国风险,他们加强研究分散制造业风险。”

泰国投资促进委员会数据显示,1-9 月日本获批在泰国的投资增加近两倍至约 81 亿美元。日产汽车周五表示,其将在泰国兴建第二间组装厂,造价 3.58 亿美元。该公司的目标是到 2017

年在东南亚国协(东盟)的销量成长逾两倍至 50 万辆汽车。

“我们扩大在泰国投资,是因为我们相信东南亚国协地区和泰国的成长前景,”日产汽车执行副总裁 Hiroto Saikawa 表示。“虽然中国经济正在放缓,但仍在成长,且是我们极重要的市场。”

日本在东南亚最大的经济体—印尼的净直接投资,今年有可能创下纪录高位,2011 年时激增至 2,880 亿日圆,2010 年则为 410 亿日圆。根据日本财务省的数据,在今年前八个月,对印尼的净日本投资已达 2,370 亿日圆。

日本上个月表示,其计划提供 130 亿美元资金,用来在印尼发展基础建设项目。印尼 2.2 亿人口的日益富裕,使其拥有庞大的内需市场。

根据日本媒体的报导,汽车厂商本田汽车和铃木汽车已宣布今年在印尼有重大扩张计划。丰田汽车则考虑兴建第三座汽车工厂,其目标是当地年产量增加两倍至 30 万辆。

泰国洪灾的警示

长久以来泰国一直是日本企业青睐的区域制造中心,但该国去年的严重洪灾,也促使日本企业分散在东南亚的业务。

马来西亚北部的檳城和接近泰国边境的周边地区近年涌入大量日企。檳城的目标是成为区域物流中心。

而菲律宾也正获得日本在激光打印机(雷射印表机)和数码相机先进镜头等高科技领域的投资。2011 年日本对当地的净外商直接投资(FDI)金额倍增至 810 亿日圆。

泰国的洪灾也刺激了增长迅速的柬埔寨制造业。柬埔寨的薪资可能最多相当於中国薪资的四分之一,不过目前为止柬埔寨的焦点仍放在技术相对较低的组装业务。

例如, Minebea 将来自泰国的零组件运至金边经济区组装,之後送回泰国进行高端作业。该公司制造小型电子产品用的微型马达,近来买进第二块工厂用地扩充柬埔寨产能,预计明年底前

将拥有 8,000 名劳工。

“日本投资人很难被说服，但一旦说服了，他们的行动就非常迅速。”亚洲开发银行柬埔寨资深国家经济学家 Peter Brimble 表示。

他指出，尽管他们仍担心柬埔寨缺乏合格的劳工，且运输基础设施建设薄弱，但已“做出(投资)决定”。柬埔寨数据显示，日本今年在该国的投资已达 3 亿美元，远高于 2011 年的 7,500 万美元。

Uematsu 表示，2010 年中国发生反日抗议事件后，日本企业对在柬埔寨从事生产的兴趣升温；今年 9 月中国出现新一波反日活动，日企业对柬埔寨的兴致再度激增。Uematsu 说，由于中国

工资大幅上扬，且时而发生劳资关系紧张，中国已成为日本企业的“难题”。

“中国年轻人已不再想在工厂工作，还有许多其他机会。”他说。

他把湄公河地区比做日本主要工业城市，表示日企愈来愈将泰国、柬埔寨和越南视为单一生产走廊。

“将之切分成三个国家很无聊。那是一个区域。”他说，“曼谷就像东京，金边像是名古屋，而胡志明市则是大阪。”

(来源：《路透社》)

美国出口原油了 中国怎么办

10 月中旬，美国开始批量出口原油。这是一则惊人的消息。

虽然美国今年到底会出口多少原油我们还不知道，但美国政府已批准英国石油公司作为第一家批量出口原油的公司，向传统美国原油主要进口国加拿大(去年是美国第一原油进口源地)出口原油。

美国作为传统能源进口(尤其是石油进口)第一大国，其出口原油是受国家法律高度管制的。以往美国出口原油，都在行政审批过程中附加了大量豁免条件，其每年可能发生的原油出口数量有限，而且从一定意义上说，并不是对外贸易，而是政治寓于经济手段中的体现。

因为，美国不仅是石油进口第一大国，还是消费第一大国，美国朝野和市场对石油的重视超乎想象，于是形成了庞大的关于石油的战略结构。如石油的国家储备；如世界市场形容美元和石油的关系，就称石油为“美元石油”，甚至美国只要在中东这个世界重要石油输出地做出外交动作，就都会被概括为“石油外交”、“石油战争”

和“石油利益至上”。

2005 年美国的石油自给率为 40% 左右，到 2010 年，仅提升为 51%；而去年也只有 55%，如今一跃成为原油出口国，这肯定意味着世界能源市场已发生了巨大的、根本性的变化去年美国还是世界第一原油进口国。美国能源署数据显示，2011 年美国每天进口 891 万桶的原油，虽是 1999 年以来的最低量，但依然是世界第一进口大国，远超世界第二中国的 485 万桶。

虽然未来美国还可能大量进口原油，但其出口能力会快速增加，已在市场预期之中。在发现大宗商品价格标准的资本市场上，纽约商品期货交易所原油(此后简称“NYMEX 原油”)的价格，和世界第二的布伦特原油同样标准合约的价格，已从历史数据上正负误差不超过 3 美元每桶(这和不同市场的交易时间、固定市场偏好有关，属正常交易价格偏差范围，超过 3 美元就会产生巨大的跨市场套利)，变化为如今相差 20 多美元每桶(截至上周最新价，NYMEX 原油 12 月期货价格为 86.28 美元每桶，而布伦特原油 12 月期

货价格为 109.55 美元每桶，相差约 23 美元)。

这个近乎梦幻般的变化仿佛在一夜之间产生，但实际不然。

新世纪以来，中国能源产业沉迷于风能和太阳能的高科技构想中。这十多年来，中国的风电和光伏产业经历了两种疯狂。一种是不惜血本的投资的疯狂，几乎所有“大风起兮”的地方，都有荷兰风景的风车，而投资光伏产业更是中国各级政府追逐的绿色 GDP 标杆，尤其是三四线城市相继出现世界级的光伏制造商，比如江苏无锡、江西新余；一种是更不惜血本挽救风电和光伏的疯狂，《证券日报》消息称，国家发改委有意向在光伏产业上投资 700 亿元，国家电网将以更优惠的方式，收购这些太阳能发的电；不仅国家高度出面，各地政府也援之以自己的大手，如无锡市政府出面重组无锡尚德；新余代赛维偿债。

而美国却始终把能源的主要战略构想和方向放在看似传统的油气开发上。虽然此传统来源于彼传统，却意味着世界能源生产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比之风能、太阳能的浪漫，这项能源有一个近乎“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新词，叫“非常规油气”，其对应的主要矿藏为页岩油气，其开发的专业术语叫“水平钻井技术和水力压裂技术”。

在此展开讨论这两项技术是不可能的。但下面几点值得中国高度注意。第一，以这两项技术开采页岩油气并完成商业化的时间长达 100 多年，其技术突破性的时间在 2006 年之后；第二，完善这两项技术，并在美国页岩油气市场呼风唤雨的公司，不是传统的美国石油巨无霸，而是众多名不见经传的小公司。

对比第一点，中国要改变能源供销结构，是任重道远的，我们的能源基础和能源工业的积累比美国落后不少。除技术进步外，美国的能源基础设施也遍布全国，如输气管道，美国本土 48 州在 2008 年有 49 万公里的管线，每年还按 2% 的增幅建设，可将油气输送到美国任何一地。而

中国则刚开始西气东输三线工程，完成后加上前两期不过 2 万公里(已建成的前两期合计支线 1.1 万公里)，尚未覆盖全国各地。

而对比第二点，需要我们改变国内能源市场涉及的诸多更重要的因素，比如，但凡能源就得国资开发，就得上升到国家战略而必须成为垄断行业。

首先可以想到的，就是受国际油价波动影响而执行的成品油定价机制。为什么选择国际市场交易分量不如 NYMEX 原油，但交易价格却远高于 NYMEX 原油的布伦特原油、米纳斯原油、迪拜原油的价格作为指导标准？要知道，即使从这三地的原油的标准看，NYMEX 原油也较高。

还有其他要面对的问题。比如，在美国出口原油，原油价格可能下跌的情况下，国内石油巨无霸在高价时代从国际市场购买的原油资产是否会缩水，如何弥补？再如，中国刚结束的第二轮页岩气招标，为何有区块流标？对已完成商业化的页岩油气开发的市场，中国将采取什么样的准入制度？怎么和已被中石油和各地政府城市内垄断的管线协调？这些都会马上成为问题，而且是大问题。

最重要的是，美国出口原油之后，我们的能源战略和原则到底应该是什么？要知道，从可采储量上说，中国的页岩气比美国还高。2011 年美国探明技术可采储量为 23.42 万亿立方米；而我国不含青藏区可采储量为 25.08 万亿立方米。新能源时代确定新能源的原则，对于还依赖煤炭的中国，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实际上，早就大量出口煤炭的美国，其煤炭可采储量 2600 亿吨居世界第一，可采比 250 年；而号称煤炭产销和消费市场最大的中国，可采储量仅在 1800 亿吨左右，可采比不过 180 年。

美国出口原油了，中国怎么办？无论如何都是一件令人着急的事。

(来源：《东方早报》)